

主 编 朱庭光

副主编 张椿年



外国历史大事集

古代部分 第一分册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克斌

679

外国历史大事记 (古代部分第一分册)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5 插页4 字印: 532千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400

书号: 11114·100 (平装)定价: 3.90元

出版说明

《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共辑入世界古代史上有一定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记述65篇，起自公元前四千年纪后期古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迄于公元一千年中期日耳曼人大迁徙。大体按照事件发生的年代先后，以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希腊和罗马的顺序依次编排。

本册编辑小组由施治生和廖学盛组成，并任主编。易建平和张小禾参加了部分稿件的编辑工作。刘欣如和郭方对个别稿件的修改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朱庭光委托张慧年审阅了全部稿件，最后定稿。封面设计姜毅。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古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	刘文鹏 (1)
埃赫那吞宗教改革	吴柔曼 (18)
古埃及和赫梯的争霸战争	周启迪 (29)
西亚农业的起源	杨建华 (37)
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	李铁匠 (48)
乌鲁卡基那改革	李永采 (64)
汉谟拉比法典的颁行	王兴运 (76)
铁列平改革	朱承思 王文英 (91)
亚述帝国的扩张	吴宇虹 (98)
犹太教与旧约全书	于 可 (113)
大流士改革	周启迪 (126)
哈拉巴文化的兴衰	涂厚善 (133)
婆罗门教	黄心川 (146)
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	崔连仲 (158)
印度列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高 杨 (171)
佛教的起源和传播	方广镭 (181)
摩揭陀称霸	崔连仲 (196)
克里特·迈锡尼文明	张竹明 (205)
荷马史诗和特洛耶战争	王敦书 (215)
希腊大殖民活动	张树栋 李秀领 (232)

美塞尼亚战争和黑劳士制度的发展	刘家和 (244)
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	钟 嵩 (254)
梭伦改革	陈唯声 (262)
希波战争	陈远峰 (270)
提洛同盟	李惠良 李永锋 (285)
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廖学盛 (295)
伯罗奔尼撒战争	张广智 (312)
叙拉古霸国的兴衰	郭小凌 (323)
马其顿的兴起与希腊反对马其顿的斗争	李长林 (337)
亚历山大帝国的兴亡	李春元 (349)
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斯巴达的社会改革运动	龚 杰 (359)
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繁荣	朱龙华 (371)
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改革	施治生 (383)
罗马共和早期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	李雅书 (395)
罗马征服意大利及其统治政策	史亚民 (408)
迦太基的兴起	王永杰 (423)
布匿战争	王煊生 (432)
阿里斯东尼克起义	何芳济 (447)
格拉古兄弟改革运动始末	王闾森 (454)
西西里奴隶起义	黄松英 (476)
马略的军事改革	朱承思 (487)
同盟者战争	房 宪 (501)
斯巴达克起义	李怀国 (512)
前三头与后三头	于贲信 (526)
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确立	汪连兴 (538)
犹太战争	孔令平 (553)
三世纪危机	梁作栋 (561)
隶农制的发生与发展	王闾森 (575)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	梁作榘 (589)
原始基督教的产生	于 可 (602)
原始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	于 可 (613)
罗马帝国晚期的人民革命运动	蔡鸿生 (629)
匈奴西迁和阿提拉帝国	莫任南 (643)
日耳曼部落大迁徙	杨邦兴 (655)
丝绸之路	莫任南 (668)

古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

刘文鹏

埃及是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伟大国家。当蒙昧人、野蛮人游荡于世界广阔土地上的时候，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尼罗河流域便已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孕育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尼罗河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埃及奴隶制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怎样一种形式？埃及早期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类社会的最初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关系于古代世界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国家问题，当然也包括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題，“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①。特别是由于埃及历史早期的文献极其贫乏与简略，加之保存下来的又往往残缺不全，愈益加深了研究古埃及国家起源、发展问题的困难。但是，上一世纪埃及古城古墓遗址的考古发掘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对于某些文化遗址、遗物的深入考察与研究，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却也给我们解决埃及国家的起源及其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某些必要的依据。

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的发生

埃及国家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在一些著作中，通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常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的答案。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断言：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的条件下，还不能确切断定尼罗河流域国家发生的日期。现在看来，这种论述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就在这一卷的稍后部分，另一作者则表示：早在第一王朝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便已形成了国家。还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埃及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开始于第一王朝的中叶。按通行的说法，埃及史上的第一王朝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0—2890年。因此，依上述的意见，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或者在公元前31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国家。

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公元前3100年前，埃及已经出现了国家。英国的《剑桥古代史》写道，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就出现了南北两个王国。还有的著作明确地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中叶，甚至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

对于古埃及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关键是如何认识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形成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

考古学提出的“史前埃及文化”或“前王朝文明”，包括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巴达里文化(约公元前4500—4000年)，涅伽达文化I(阿姆拉文化，约公元前4000—3500年)、涅伽达文化II(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文明”与“文化”，虽然在概念上有联系，但决不能混同。严格说来，埃及的文明是从涅伽达文化I的末期开始，到涅伽达文化II时代最后形成。

涅伽达文化I与巴达里文化一样，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铜器、石器与陶器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愈益专门化，并且与亚细亚部族早已有了商业关系。

涅伽达文化I的遗址已发现有居住地和墓地。居住地筑有雉堞墙，并有防御工事，所以，涅伽达I的人民被称为“城市居民”。

涅伽达附近的一个被称为“南城”的居住地是一个重要的遗址，其堡垒和近似长方形的房屋是用小砖筑成。这是一个设防的城市。恩格斯曾经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①。

涅伽达文化I时代，墓穴已有大小、充裕简陋之别。在阿巴底亚，最大和最富裕的墓是妇女的墓。这种现象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墓中，还发现了作为陪葬的巫术用品。西方埃及学者认为，这种迹象表明墓主是“巫师或女巫医，是公社的重要成员，或许甚至是他们的领袖”。还有的学者讲到，在前王朝时代早期，每个乡村是自治的，并且有一个首领，他的权力依赖于他作为一种“呼风唤雨王”的名声，他大概是能管理尼罗河洪水。这些推论，与恩格斯所说的个别成员“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的论述相一致，而且“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②。

研究埃及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考古文物保留下来的有关王衔与王冠起源的记录。其一是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一块陶罐破片，罐标上是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屋顶上栖息着一只小鸟。这种圆屋顶的建筑物可以看成是后来的“王宫的门面”，也可以称为“御座”。屋顶上的一只鸟则是隼鹰神荷鲁斯的粗略形象。荷鲁斯是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的保护神，并且是国王的第一个头衔。第一王朝的国王后来都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160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其二是涅伽达1010号墓中发现的一块带有红冠浮雕的黑顶陶片。红冠是埃及国王的两种基本冠式之一，也是最受尊敬的王徽之一。王徽王衔形象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的萌芽与产生，关系于国家的形成的问题。这两块重要的历史文物，根据英国F·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S. D.)的划分，王衔陶片定年在S. D. 37，即涅伽达文化I之末期；红冠王徽的陶片定年在S. D. 35—39，约当涅伽达文化I之末期或涅伽达文化II之初。

涅伽达文化II时代，墓穴发现的很多，仅在涅伽达就发掘出2149座“史前墓”。涅伽达文化II的居民更精心制作的墓呈长方形的，并且有了砖墙结构，但是穷人仍然葬于圆形墓穴中。涅伽达的T墓地是富裕的，在那里分布有几十座大小形状不同的墓，其中除了个别的圆形或半圆形与正方形外，绝大部分都是长方形的，并且有几座规模较大的墓。研究者认为，T墓地是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墓地。在希拉康坡里发现了著名的第100号墓，因其墙壁装饰以壁画，故又称为“画墓”或“装饰墓”。“画墓”的尺寸大约 $4.5 \times 2.0 \times 1.5$ 米，与T墓地20号墓的 5×2 米大小差不多，而且同样是长方形的砖砌的，并带有间壁墙的结构。画墓与T15、T23墓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希拉康坡里画墓虽曾被盗，遗物多有丢失，但保留下来的仍有32件之多，与仅有数件陪葬品的一般墓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已证明：画墓是“首领墓地的一部分”，属于“王家墓地”，“埋葬在装饰墓中的人物应看成为上埃及传说中的王”。还有的论证，希拉康坡里的画墓和涅伽达的T墓地两者是“前王朝国王的埋葬地”。

除了国王的墓地外，希拉康坡里画墓的壁画给我们保留了土著与外来入侵者之间战斗的形象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画面上出现了手举权标头的国王打杀跪在他的面前的俘虏的场面。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前王朝末期的一些调色板和权标头上(详见后页)。

涅伽达文化II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最早

的文字见于圆筒印上，而最早的圆筒印，迄今所知，出自涅伽达1863号墓(S. D. 46)，大约相当于涅伽达文化Ⅱ的中叶。在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多见于权标头、调色板等文物上。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文字在历史上的地位，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①。

根据上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居地遗址的设防，墓葬的分化，王冠、王衔的起源以及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等现象，可以确认，早在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的氏族制度已经解体，国家萌芽，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到了涅伽达文化Ⅱ时代，国家最终确立，形成了历史上最古老的尼罗河文明。

州的分立、联盟与争霸

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氏族制度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但是，埃及国家最初是什么形式的？其随后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由于考古资料的残缺不全，特别是文献资料的贫乏，常常引起不同的推测，以致引起意见的分歧。

在本世纪初，美国的埃及学者J. H. 布列斯特论述埃及国家产生时，提到希腊人称为“州”（诺姆）的“史前小国家”，并认为它的人民“已处在被看成是象巴比伦那样的城市出现和城市国家的文明阶段”。近年西方出版的著作中，有的直接把州说成是“城市国家”。苏联新出版的《世界古代史》把州说成是“初期国家”。但是，也有人反对对州的城市国家的性质。E. J. 鲍姆伽特虽然承认城市的存在，但却认为“州的建立的确不是一个城市国家”。苏联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

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虽然也讲到了州的出现，但是同样否认它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性质，仅仅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地区”。还有的人认为，州是“地域的区划，它形成了历史时代埃及政治结构的基础”。

埃及文明时代早期出现的州，是一个单纯的“地域”的公社，还是具有城市国家性质的初期国家？需要我们结合历史的实际加以论述。

我们通常所用的“州”这一术语，正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根据古希腊人所说的“诺姆”一词翻译过来的。希腊文的诺姆，相当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斯帕特”一词的意符表示以灌溉河渠区划的土地，所以，“斯帕特”一词意味着“区”或“地域”。上面提到的希腊文的州，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具有“地域”的含义，是就其语言学上的意义而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考古学上对州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考察。

前王朝时代的居住地遗址发现甚少。希拉康坡里遗址是涅伽达文化II时期的少数重要遗址之一。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凯赛尔相信，希拉康坡里的前王朝居住地遗址可能是一个中心城市和许多附属的乡村，占据了一百万平方米的总面积。但是，巴塞尔怀疑居住地遗址有那样大片的面积，认为那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作为瓦砾堆常常是非常稀疏的。按照他在1958年的勘察遗址的最后结果证明，表面陶器碎片分布的范围，很难超过50,800平方米；人口或许4,700人左右，至多不过10,000人。在前王朝时代，整个埃及人口大约在100,000至200,000之间。根据希拉康坡里的人口及其在整个埃及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它一定是一个较大的城市。

埃及的州，除了具有地域的性质外，也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史前时代”埃及政治史的考古证据提供的甚少，但是有些学者相信，在涅伽达文化时代，上埃及已

发展了城市文明。希腊人命名的埃及的州就是“起源于自治城市的地方”。

每个州除了一定的领域外，通常还有其独特的标志或徽章。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一些彩陶和希拉康坡里画墓壁画上描绘的舟，通常有两个称为“船仓”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船仓前插入固定的或可能移动的杆子，上面往往挂有一个徽章。徽章的形式不同，有的是各种不同的动物，也有的是三角形，圆形或Z形的几何图案。那些特殊的Z形符号，有人把它看成是神圣物或神的标志。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神的标志而否认它是州徽，那么，我们不能不提出州的保护神的问题。

每个州，事实上都有其固有的保护神，如隼鹰(荷鲁斯)、母牛(哈托尔)、蛇(涅特)等，它们显然都是由氏族图腾演变来的。希拉康坡里崇拜隼鹰神荷鲁斯，而涅伽达则崇拜暴风雨神塞特，它们在后来王权神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鹰、蛇等神圣动物在法老时代还成为国王的保护神。

州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王权的出现。在涅伽达发现的王徽与王衔的符号，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希拉康坡里出土了属于前王朝末期的各种权标头，是王权产生的一种标志。此外，正象前面已提到的那样，在涅伽达墓地和希拉康坡里墓地，都发现了最大和最重要的墓，而且它们那里已被确认为“国王埋葬地”。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前王朝时代后期，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等都应该是各自分立的的城市国家，或者“州国”。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州或州国的数目，至今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说明。通常认为，古王国时代上下埃及共计42个或40个。也有的说38个或39个。不过，这时的州，已失掉了其独立的的城市国家的性质，而成为统一国家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是，前王朝时代州的数目，决不会多于上述数字，只能少于或大大少于它。因为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疆域是有限的。仅仅在涅伽达文化Ⅱ末期才

开始由上埃及向三角洲移民。

如果说，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埃及出现了独立的州，那么，到涅伽达文化Ⅱ的末期，便形成了州国的联盟与争霸的局面。考古学家发现的前王朝末期的一些历史文物给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证据。这些历史文物，除了部分象形文字符号外，都是刻有各种场面的图刻。尽管对其内容的理解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推测的性质，但是要知道，在前王朝时代末期，或者早王朝时代的初期，成文的历史文献几乎是没有什么的。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狩猎调色板”(“猎狮调色板”)，共计划画了19名猎人打扮的人物。他们手执权标头(梨头棒)并装饰以动物尾。前者是权力的标志，后者是国王之装饰物。这种现象又见于那尔迈调色板。猎人中有两人分别举着不同标志的两面旗帜，其象形文字符号意为“西方”和“东方”。图刻中的长方形宫室图样，表示三角洲的神殿建筑。板面上共有大小三只狮子，其中两只已中矢。整个图刻表现了三角洲东部和西部各州联盟打败了以狮为标志的敌对的州。

“战场调色板”(残片)所描绘的内容，也许与上述事件有关。正面的图刻是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狮、鹰、朱鹭联合噬食被打倒了的敌人和追赶正在逃跑的敌人。中间部分的大狮子是非常突出的。调色板的左面上端有鹰和朱鹭为标志的两面旗帜，旗杆上各长出一只手紧紧抓住被绑的俘虏。右上端一个被绑者的面前有一束纸草的象形文字符号，可能表示被击败的三角洲居民。战场调色板描述了鹰州与鹭州在狮州(也许就是上述事件中的失败者)的领导下，联合攻击并俘虏了三角洲居民的事件。

研究州的联盟与争霸的最重要的资料是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关于蝎王权标头的时代及其与那尔迈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有些争论。但是，通常把蝎王看成是前王朝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是那尔迈的直接的前辈。蝎王权标头描绘了希拉

康坡里的蝎王在战胜敌人后举行了庆典活动。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前王朝时代的阶级关系。权标头上表现的不同标志的旗帜下悬吊的“田凫”，作为象形文字符号，读为rhyt。埃及学家A. 伽丁内尔认为，rhyt一词意为“平民”，“人类”。它从开始就表示“下层阶级”，且“总有叛乱倾向的”。他们是指“敌视希拉康坡里王国的任何埃及人”。后来有些文献也涉及了rhyt被平定、镇压，和作为国王的臣民以及与贵族相对立的普通人。在蝎王权标头图刻上，除了田凫外，有一个旗杆上吊了一只弓。“弓”的符号还出现在较后的纪念物上，数量总是九个。有的学者认为九弓象征着“埃及的敌人”，或“埃及的外国敌人”，或者“一切被镇压的人民”。

蝎王对外军事上的胜利，也涉及到他与其他各州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权标头图刻上，蝎王虽然戴着白冠，而且处于极显著的中心地位，但是，同样也刻画了他的同盟者的军旗。这些场面表示希拉康坡里统治的王不是后来的有无限权力的君主，确切地说，诸州同盟的领导者作为盟国对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

统一王国的形成

古代埃及究竟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埃及学中也是众说纷纭的。《剑桥古代史》的作者写道：“传统和事实上的一些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王国：北部的王国，它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并且向南延伸到现在爱特斐附近（下埃及）；而南部王国包括爱特斐和赛勒赛拉（上埃及）。国王的官邸被认为座落于西北三角洲的拍，和位于河西岸、埃德弗附近的涅亨（希拉康坡里），两者在历史时代至少具有重要的、统治者保护神鹰荷鲁斯的圣所。在拍附近设置德普，眼睛蛇瓦吉特（埃胶）女神的所在地；两个地方在

新王国和以后被当作一个名字拍尔·瓦吉特(埃及的荷鲁斯),被希腊人表示为布陀。“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他被认为是蝎王的直接继承者”。

上述引文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前王朝时代是否存在上下埃及两个王国的问题;一是那尔迈毕竟在多大程度上统一了埃及。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上下埃及王国的问题,尽管常常出现在一些著作中,但是,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的记载。帕勒摩石碑上的王名表残缺破损,不能给我们提供上下埃及王国的什么证据。况且,它还是在所谓两个王国统一后近乎700年之久铭刻出来的。所以,上下埃及王国的出现,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根据。正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这个事件是从后代的国王头衔中的涅布提名(二夫人名或二女神名)和尼苏特·毕特名(上下埃及王名)、官职双重构造、上埃及之白冠和下埃及之红冠的存在等推断出来的”。既然上下埃及王国之名,不见于当时的文献记录上,而是根据王衔、王冠等推断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论述王冠、王衔的起源及其有关的问题。

在王朝时代或法老时代,埃及国王完整的头衔是由五个所谓“伟大的名字”组成。其中作为对应的头衔有涅布提名(nbty,“二夫人”)和尼苏特·毕特名(n-sw-bit,意为“他属于菅和藤”)。涅布提或二夫人衔名是由兀鹰女神和眼镜蛇女神组成。兀鹰女神为上埃及的保护神;眼镜蛇女神为下埃及的保护神。伽丁内尔认为,那是在埃及还是被分成两个王国时,国王对紧靠第一王朝以前时期的两个主要女神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大概,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是第一个采取涅布提头衔,因此象征了他曾统一了两个王国的事实。但是,E. J. 鲍姆伽特新研究证实,涅布提作为王衔,“不包含在登王以前的国王衔名中”。

尼苏特·毕特头衔是由一种称为“苏特”的植物(菅茅)和称为

“毕特”的动物(蜂)符号表示的，又称为“树蜂衔”。“苏特”植物是上埃及的标记。“毕特”是蜜蜂，通常代表下埃及。树与蜂的结合意味着“上下埃及之王”。但是新的研究证明，“毕特‘养蜂者’仅能与曼神联在一起。他是野蜂的主宰，而蜜蜂是献祭给他的”。曼神是涅伽达文化I的民族神，他的形象是公牛，国王由曼接受“强壮的公牛”的名称，他的俗界的形式是国王。因此，“毕特”衔应该是代表上埃及王衔。至于“尼苏特”衔，由于它的地位，在衔名制度上必定是较老的头衔。所以，两种头衔最初都是代表上埃及的。

传统上，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但是新的研究证明那是晚后的事情，在前王朝时代红冠并非与下埃及有关。红冠最早见于涅伽达，白冠最早出现于希拉康坡里，两者都是出于上埃及，而且两地相距不远。在年代上，红冠先于白冠，说明红冠是古老的，代表了土著民族。白冠是晚后出现的，是新来的涅伽达文化II民族的王冠。E.J.鲍姆伽特的结论是：“……土著的埃及传统是那样的强有力，以致合法的王必须采用古代的头衔和徽章，而且所有的头衔和徽章都有它们的上埃及的起源，而这在早期，从下埃及来的东西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对于王衔和王徽问题的新的考证，使我们对所谓的上下埃及王国的存在不能不表示怀疑。

关于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要说明的是，古埃及的统一究竟在什么时间？一种意见，“埃及在前王朝时代晚期或许政治上已统一，即使这种统一还没有使其在纪念性艺术或建筑上，或在任何文字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另一种意见，把皮特里收藏品中的两个黄色大石灰石权标头残片(UC 14898和14898A)上的戴红冠者看成是蝎王，并把它与通常所说的蝎王权标头上的戴白冠的蝎王联系在一起，证明早在蝎王时，而不是他的假定继承者那尔迈时代统一上下埃及的。更有甚者，